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

丛书主编/李玉洁

中国古史传说的 英雄时代

李玉洁/著



中国远古时代英雄辈出，神话传说源远流长，
构成了华夏民族形成的完整序列，记录了中华民族光辉的成长历程。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
丛书主编/李玉洁

中国古史传说的 英雄时代

李玉洁/著

I207.7
L322



I207.7
L322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史传说的英雄时代 / 李玉洁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 / 李玉洁主编)

ISBN 978-7-03-026301-8

I. 中… II. 李… III. 神话 - 文学史 - 研究 - 中国 IV. 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1750 号

丛书策划: 胡升华 侯俊琳

责任编辑: 宋旭 陈超 李俊峰 / 责任校对: 赵桂芬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张放 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000)

201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插页: 2

印数: 1—3 000 字数: 268 000

定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丛书”

编委会

学术顾问	李学勤	朱绍侯	姚瀛艇	郝本性
	晁福林	王 巍		
主 任	李小建	苗长虹		
副 主 任	覃成林	高有鹏	牛建强	刘东勋
主 编	李玉洁			
编 委	苗书梅	程遂营	王蕴智	张新斌
	郑慧生	涂白奎	袁俊杰	薛瑞泽
	陈朝云	孔 学	郑贞富	陈彩琴
	石 涛	周保平	毛阳光	马玉臣
	李海龙	王德安	吴爱琴	宋军令
	杜 鹃	郭 霞	李玲玲	李婉婷
	史志龙	杨 玄	崔增磊	何 新
	吕西红			

总序 一

坐落于黄河之滨的古都开封的河南大学，是闻名遐迩的百年名校。教育部近年在河南大学设立了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心人才济济，覆盖了众多相关学科，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良好成绩。该中心李玉洁教授组织编写的“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丛书”，即将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不难预料其将在学术界产生显著的影响。

黄河文明是辉煌绵远的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对黄河文明的考察研究，当然对阐述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有着重大的意义。大家知道，以分区域的方法来探讨我国的历史和文明，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突出的发展趋势之一。回顾这些年历史学研究的明显变化，是强调“多元一体”的观点，揭示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灿烂的中华文明乃多民族、多地区的人民共同缔造。同时，考古学研究也反复证明中华文明是多源、多线的，构成了文化区系的理论。这样就开拓了学者的视野，推动了学科的进步，特别是对中原以外地区的研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然而，提倡加强中原以外地区历史文明的研究，绝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抹杀中原地区在文明史上的重要性。黄河文明的历史意义是不可忽略的。回忆十几年前，我和浙江的徐吉军先生曾与多位学者专家合作，出版了一部《长江文化史》，幸而得到了大家的欢迎。随后我们考虑到中原地区的重要，又安排编写了《黄河文化史》。在后面这部书的序言里，我专门说到，中华文明固然是多源头、多区域的，但也必须承认，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会起特殊的历史作用。具体地讲，在文明发展的若干关键时段，特定的地区会成为中心或者枢纽。例如，中华文明奠基的夏、商、周三代，以及以后的许多王朝的中心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对于这样的时期，将黄河文明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确实是应该的。何况在三代以后，这一地区的影响仍然持续，需要探索的问题依旧很多。

关于黄河文明，我认为应该考虑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黄河文明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



第二，黄河文明为什么能够在历史上占有这样的地位？

第三，占有历史上特殊地位的黄河文明有哪些特点？

正因为黄河文明在文明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作用，教育部才在河南大学专设这方面的研究中心，并且由李玉洁教授主编完成这套“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丛书”。这套丛书共分九个子课题进行研究，从若干角度研讨了黄河文明的特点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因素，从各个方面阐释黄河文明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句话，中原地区之所以在历史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键的原因正在于其地理位置在当时的“天下”中央，居八方辐辏之地，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上占了优势。这套丛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1) 丛书首先对黄河流域文明的要素：金属、文字、城邑以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形成进行研究。

《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一书，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出现、铸造工艺、繁荣与影响进行研究，并把眼光集中于夏商周时期，那时青铜器的演变序列业已大体清楚，该书对有关的青铜文明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

作为文明最重要标志的文字，《殷商甲骨文研究》就中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载体——甲骨文作了全面的论述，其中不乏新见解。

《黄河流域史前聚落与城址研究》对黄河上、中、下游的聚落与城址进行探讨，研究了聚落与城址形成的地理地貌和发展轨迹。

《中国古史传说的英雄时代》论述古史传说的神话性质及某些传说中的历史真实，把历史传说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对黄河流域古史传说中的英雄时代及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形成进行系统的论述和研究，有诸多新意。

(2) 丛书还对黄河文明的特质进行研究，即探讨黄河文明与其他地区文化的差异之处。历史上的中国，经济以农业为基本，文化以儒学为主流，而黄河文明即与二者有密切关联。

《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对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起源、发展进行研讨，并且对黄河流域出现的农书、农神、农商思想与古代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重点阐述植根于农业经济的黄河文化的特色。

儒学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主导的思想理论。《儒学与中国政治》一书，论述儒学的起源、发展，研究了儒学与中国政治的密切关系。

(3) 秦汉以后，黄河文化不断地吸收各地区的文化，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丛书在对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问题探讨之后，对黄河流域的历史变迁进行研究。

《秦汉魏晋南北朝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研究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文化与胡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唐宋时期黄河流域的外来文明》研究了唐宋时期黄河文化与外来文明的融合。

《黄河文化与西风东渐》研究了明清时期黄河文化对西方文化进行全方面的吸收过程，黄河文化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丛书对黄河文化与国内外文化的融合问题进行研究。这些书虽非出自一人之手，却将有关问题比较系统地串联起来，勾勒出相当明晰的轮廓，其中不乏新鲜的观点和见解。

读了这几本书，自能对黄河文明的历史地位获得进一步的认识。由这样的视角去观察黄河文明与文化，前人还很少做过。

黄河文明是非常博大的研究领域，“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丛书”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丛书都很值得一读。希望继续编写下去，我们且拭目以待。

李学勤

2009年1月20日

总 序 二

黄河文明的历史地位

关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曾出现了“满天星斗”说、“文明多元”论等，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中华文明是各地区、各民族的人民经过几千年辛勤的劳动共同创造的。然而根据学术界所认可的文明起源的要素和标准来看，华夏文明最早是在黄河流域出现、形成的。在文明形成的初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天下之中”的地位，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关于文明起源的见解。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人类学教授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中提出，文明的产生有三项要素：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197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一书补记中提出，青铜器、文字、宫殿基址是文明产生的三要素。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青铜器、文字、城堡是文明产生的三个标志和要素，并且得到了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文明和国家的形成主要有两项要素：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建立；②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恩格斯说“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①，他用阶级斗争的学说去解释文明的产生。这些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起源的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是判定文明产生的标准。

一、华夏文明最早在黄河流域形成

黄河是大自然献给中华民族的厚礼，是我们伟大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 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 北京：人民出版社. 167, 166, 173

源于巴颜喀拉山脉北麓，从青海高原奔腾而下，流经五千多公里，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形成宽广美丽而富饶的冲积大平原，为黄河文明的诞生提供了优越的地理环境。

黄河中下游地区四季分明，是最适合古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地区。大约一万七千多年以前，黄河流域就有人类生存了。华夏民族的祖先在这里勇敢顽强地劳动和开拓，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和文化。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及我国历史上的诸多王朝皆建都在黄河流域。是时，这里是人文荟萃之地，号称“天下之中”，又称为“中原”、“中州”，乃至我们伟大的祖国被称为“中国”也与此有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文明的要素——金属、文字和城堡，最早在黄河流域出现和形成。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文明的中心。

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就出现了青铜器物。仰韶文化姜寨遗址出土有铜片，还发现有黄铜管，其时代约在公元前4700年左右。

铜器，在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多有发现，如郑州牛寨遗址发现了熔铜炉壁附有铅锡青铜块^①，淮阳平粮台三期H15发现了铜渣^②，登封王城岗四期H617内出土青铜器残片^③，临汝煤山遗址出土铜坩埚、熔铜炉残壁及铜液痕迹^④，鹿邑栾台遗址二期早期发现青铜器等。^⑤ 这些资料表明当时黄河中游青铜器冶炼和使用比较普遍，已经进入早期铜器时代。在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出现了国家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山西临汾陶寺墓葬中发现了一只铜铃（或铜铎），虽出自晚期墓葬，但这是一件工艺复杂的复范型大型铜器，表明在此之前，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应该已经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了。陶寺遗址大型墓中出土了特磬，并且有5座大墓中出土了用鳄鱼皮蒙面的鼉鼓，鼓身为挖空树干，通高1米许，上下口径43~57厘米，外表彩绘花纹。这种乐器首先发现在黄河流域龙山时代的文化中，可能最初为陶唐氏所发明。

目前，新石器时代考古所发现的青铜器只在黄河流域出现，其他地区或者只有很少的几个铜片，或者只是在淤泥中出现的一点铜锈痕迹，而且仅是一处孤证，或者根本没有出现过与青铜器有关的器具和器物。黄河流域以外地区的青铜文明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① 王震中. 1998. 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 1983.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 文物, (3): 36











③ 安金槐. 1983. 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 文物, (3): 3

④ 1982. 河南临汝煤山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4): 446~453

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1994. 河南考古四十年.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关于文字的起源应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器物上的刻画符号。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和石柄上就已经出现刻画符号。龟甲上刻有“”、“日”、“八”、“女”、“彡”、“”、“”、“”、“”等。^①

1963年出版的《西安半坡》中公布了半坡遗址出土的大批陶器上有刻画符号。有的符号较简单，有的稍复杂。在仰韶文化类型遗址的陶器中多有这种符号，目前在渭水流域的西安、临潼、郃阳、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都有发现。^②

大汶口文化类型的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上发现了陶尊文字17个。其时代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有关资料介绍：“自60年代以来，陵阳河发现刻文陶尊均出于河滩一组墓地（富有者墓地），共10件。采品6件，完整器5件。刻文分别为‘’、‘’、‘’、‘’、‘’、‘’、‘’、‘’。另一件为1979年发掘采集的陶尊残片，刻文为‘’……M25的一件刻文为‘’。陵阳河发现的陶尊刻文，共计12个个体。如将刻文归类统计，得图像一，图像文字凡七。”^③我国许多学者，如唐兰先生、王树明先生等对这些文字均有考释，认为这是现行文字的远祖，陵阳河的陶尊文字与殷墟甲骨文字有渊源关系。

与原始文字有渊源关系的远古符号也在黄河流域大量出现，河南舞阳的贾湖，山东大汶口，陕西西安、临潼、郃阳、铜川、宝鸡和甘肃秦安等遗址出土的大批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与中国古文字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殷商时期，大批的甲骨文在殷墟（今河南安阳市）出土，在世界古文字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黄河流域在仰韶文化晚期已发现古城堡。郑州西山古城址是仰韶文化的遗存，距今5300~4800年。^④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更为普遍，如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址、登封王城岗古城址、郟城郝家台、安阳后岗、浙川下寺等。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距今4500年左右。城址呈正方形，长宽均为185米，城周长740米，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城墙采用小版筑堆筑法营造，可见圆形夯窝。城有南北两城门。南门有用土坯垒砌的两个门卫房，中间是

① 王蕴智. 2003. 远古符号综类摹萃. 中原文物, (6): 11

② 李学勤. 1997. 走出疑古时代.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③ 王树明. 1986. 山东省史前文化论文集·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 济南: 齐鲁书社. 249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1994. 河南考古四十年.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路土，路土下有铺设好的排水管道，城内有建筑在夯土台上的用土坯垒砌的排房。高台上的第4号房基的房址，东西残宽15米多，南北进深5.7米，室内北边有一宽约0.92米的走廊，南边再用隔墙分为四间。可以推测，在夯土高台上居住的人绝非一般平民。^①

登封王城岗古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西部，距今约4400年，这是两个并列的古城。大城的复原面积约34.8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在河南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②王城岗古城址的城内有殉人、殉兽的奠基坑13个。这些奠基坑多者用7具人骨奠基，少者1具，共有28具人骨架。王城岗龙山文化三期发现一薄胎磨光的平底杯，杯的底外部有烧前刻画的一个文字，形似“共”字。王城岗龙山文化四期，发现一青铜容器的残片，编号为WT196H617:14，残宽6.5厘米，残高5.7厘米，厚0.2厘米，很像铜鬻的腹与袋状足的部分残片。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室检验是锡铜青铜铸件。^③

安阳后岗遗址发现一段宽2~4米，长70余米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墙。该遗址约5万平方米。遗址分布着直径约3~5米的圆形白灰面房基和木板地面房基，这些房基的下面有用小孩作牺牲的奠基，埋1个幼童的8座，埋2个幼童的4座，埋3个幼童的2座，埋4个幼童的1座，仅在发掘的600平方米内，埋幼童26个。这个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700年~前2200年。河南辉县孟庄龙山文化古城址，面积约16万平方米，有护城河等，具有军事性质。

黄河下游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址亦发现许多古城址。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城址，总面积17.55万平方米。1984年在寿光县边线王村发现一古城址。城址分大小两处，小城在大城之内，居中偏南。大城面积约5.7万平方米，四边城墙之中部各有一门道，门宽约10米。城内面积1万平方米左右。大城址距今3800年左右，小城距今3900年左右。^④1991年邹平丁公村发现一古城址，面积11万平方米。城址年代在距今约4600~4000年。^⑤另外淄博的田旺村亦发现一个面积20余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古城址。^⑥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1983.河南淮阳平粮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3):37

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文物研究所.2006.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9):4

③ 河南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1992.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北京：文物出版社.38

④ 杜在忠.1988-7-15.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

⑤ 邹平.1992-1-12.丁公村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

⑥ 齐天.1992-3-18.田旺龙山文化城址面世.大众日报

从以上黄河流域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来看，城址中或有城门和门卫房，或有护城河，是具有军事性质的城堡。城内（如平粮台城址中）高台上的高大建筑物表明城内居民存在阶级和阶层的差别。登封王城岗城址和安阳后岗城址中用幼童作奠基的殉人，表明激烈的社会冲突已经形成，高居于平民之上的公共权力已经形成。龙山文化时期长江流域的古城堡虽然显示了贫富分化的现象，但远不如黄河流域表现得那样尖锐和激烈，似乎还处在军事民主制时期。^① 在黄河流域，早期国家已经形成了。

二、黄河流域出现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

黄河流域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流传着许多鸿蒙初辟时期的神话，如盘古、女娲等都是神话中的开天辟地或抟土造人的英雄。这些神话传说表现出华夏民族对世界的最初认识和美好的想象。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活跃着许多部族，并各有自己的领袖。这些部族领袖往往被神化成半人半神的英雄。我国古代史籍中有许多关于远古时代英雄的传说，其中有三皇时期的传说，如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葛天氏、柏皇氏等；还有五帝时期的传说，如黄帝、炎帝、太皞、少皞、蚩尤、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他们皆是黄河流域的部族领袖。这些传说构成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完整序列，记载了中华民族光辉的成长历程。

五帝时期，在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的雏形。这些部族首领皆拥有号令征伐、收取贡赋、征发劳役的权力，而且这个时期，地域关系已经形成，有了非常明确的政治选举制度。这些部族首领已经拥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认为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这些现象说明黄河流域的部族自五帝时期就具备了早期国家的特征。

1. 号令征伐的权力

号令征伐是公共权力形成的典型表现形式。《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里很明显，黄帝轩辕氏对不顺从者，“征之”、“去之”，使“诸侯咸来宾从”。号令征伐，使诸侯“宾从”，就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正因为拥有这种公共权力，黄帝才能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最后消灭了敌对势力，使自己的权力得以巩固。

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颛顼氏与少皞氏都曾有过激烈的部落冲突。

^① 张绪球. 1994. 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 考古, (7): 634



帝尧时期，曾进行过征伐三苗的战争。《国语·楚语下》曰：“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韦昭注：“其后，高辛氏之季年。三苗，九黎之后。高辛氏衰，三苗为乱，行其凶德，如九黎之为也。尧兴而诛之。”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尧时期，天降大雨，黄河泛滥。尧于是召四岳（四个部族酋长）商议治水事宜。四岳推荐鲧，但鲧治水九年而无功。《史记·夏本纪》记载：“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舜可以殛鲧以死，并有权令鲧的儿子禹接替治水。舜还任用“八元”、“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①。《尚书·虞书·舜典》云：帝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骀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舜作为一个部族领袖可以流放或杀掉一个下级部族的首领，表明公共权力的形成。黄帝、颛顼、高辛、尧、舜等皆有号令征伐的权力。依靠这种权力，他们才能在战争中打败敌方，从而攫取更高的权力。

2. 收取贡赋

《史记·夏本纪》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又云：“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由此可知，虞舜时期已经开始向百姓征收贡赋，并有了完备的贡赋制度。收取贡赋是公共权力形成的典型特征。黄帝、颛顼、高辛、尧、舜已经具有国君（或国王）的权力了。

3. 征发劳役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舜杀了鲧之后，又任用鲧的儿子禹治水。大禹治水时，“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尧、舜、鲧、禹等人的治水，当然需要征发很多人去服劳役。征发劳役亦是公共权力形成的特征。

4. 地域关系的形成

黄帝时期，曾东征西伐，打败了炎帝、蚩尤，颛顼氏与太皞氏、少皞氏等都发生过激烈的战争和冲突。被打败的部族则皆迁徙他处，其部族支裔四散，迁至偏远地区。如少皞氏在失败之后，其主要力量迁徙汾水流域，仍有一部分还在东夷地区，那些留下的居民则只能服从于胜利者的管辖。毫无疑问，黄帝、颛顼、尧、舜时期，其国民已按地区划分。地域关系已经形成。《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里所说的“万国”，当是黄帝治下的各个地区的小邦国。

^① 司马迁. 1982. 史记·五帝本纪. 北京: 中华书局

5. 禅让制度与世袭制度

尧、舜、禹等部族领袖在权力的承继方面实行禅让制度，部族首领是通过禅让选举而产生的。《论语·尧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在传位给禹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话。《论语·颜渊》云：“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尚书·尧典序》曰：“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但是禅让制度曾遭到战国学者的质疑，不相信古代实行过禅让制度。《孟子·万章》记载，“万章曰：‘尧以天下为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韩非子·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我们且不说尧舜禹时期的帝位是“让”，还是“逼”，但五帝之前，包括五帝时期的部族首领肯定曾经实行过禅让制度，这是不容置疑的。尧舜禹时期的禅让现象是中国远古时代禅让制度的继承和继续。禅让制度确实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夏代开始了传子制的世袭制度，很多人认为传子制才是国家形成的标志，并在此基础上认为夏代才形成了国家。

如果说传子制是国家形成的特征标志，那么希腊的国家首脑从来就没有传子制，其首席执政官和其他执政官皆是由选举而产生的。而谁又能说古代希腊不是国家呢？！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产生的标志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建立和地域关系的出现。传子制不是国家产生的标志。

我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太皞、少皞、颛顼、帝喾、尧、舜等，具有号令征伐、收取贡赋、征发劳役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他们拥有的辖地上，不仅有本部族成员，而且已经按地区划分其国民。他们是活动在黄河流域的国家领袖，即国王。是时，黄河流域最早出现了青铜文化、文字，较早出现了城堡。古史传说中，华夏民族的领袖也多活动在黄河流域，华夏文明最早在黄河流域形成。

三、黄河文明的特质

黄河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农耕文明。黄河文明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① 研究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形成及特征，对深入了解文明进程、文化兴衰以及这个文明体系中人民的精神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45

黄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古文化遗址，如磁山、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农业是这些远古文化的主要内涵。自新石器时期开始，华夏民族已经成为农业定居的民族。黄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农业发源地之一。

在长期艰苦的劳动中，黄河流域的人民发明了农业，在野草中培育了五谷等各类农作物；发明了农业生产工具，并使之不断地改进，将其从木、石质改进为金属工具；创造了历法，制定了二十四节气，认识了天象与农业的关系；发明了丝绸，中国是世界闻名的丝绸之国；华夏民族有自己的农神崇拜。在黄河流域这块热土上，华夏民族辛勤勇敢地劳动，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建造了自己的家园。

由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出现和形成，封建国家制定了各种农业政策和赋税制度。黄河流域产生的农业思想，特别是中国封建王朝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和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有重要的影响。商业被限制，客观上也束缚了农业的发展。重农抑商的政策和思想，其目的在于巩固加强其专制统治，实际上则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是黄河文明的重要特质。儒学是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统治的理论基础，与中国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礼和仁的思想。儒家所说的礼，是一种标志尊卑贵贱等级的制度。《礼记·坊记》曰：“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

所谓仁，就是以仁德之心对待人民。儒家主张仁政，反对苛政。儒家学说要求帝王和国家的大小官员勤政爱民、奉公守法，要求人们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做人做事要有廉耻之心，维护做官的清德，不欺暗室，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认为这样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儒学从政治上讲，确实是为帝王统治服务的学说。然而，儒学能够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而不衰，除了封建帝王的推崇和提倡之外，能够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也是重要的原因。

儒家提倡的道德观，如忠、孝、仁、义、廉、耻、宽、恕等，是我国人民两千年来恪守的道德伦理基础。儒学的伦理道德、重义轻利、敬老爱幼、乐于进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态和理想人格，也激励着中国的志士仁人去建功立业、英勇奋斗，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儒家学说提倡的“礼”保证了封建国家的等级制，维护了皇帝和各级

贵族的利益；而“仁”又能使平民百姓们认可接受。这样封建国家的秩序就得以稳定。儒家学说是适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学说，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四、黄河文明的历史变迁

夏、商、周三代之后，早期国家逐渐成熟，进入了发展时期。春秋战国以后，中国的专制制度逐渐形成，随着秦汉王朝的统一，黄河文明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黄河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黄河文化与胡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时期。本课题通过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时段少数民族与黄河流域的社会交往，论述了秦汉时期少数民族文化与黄河文化的融合过程。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以洛阳、长安为起点，直达安息、大秦的交通线形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西域的葡萄、西瓜、乐器、胡马，传入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铁器、丝绸、医药、造纸、印刷术、农业技术传入西域，大大丰富了黄河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宝库。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新疆地区的罽宾国“地平温和：有目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玕、珊瑚、虎魄、璧、流离”。大秦国即罗马古国。《后汉书·大秦传》记载，大秦国物产丰富，“多金银奇宝：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九色玉石、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绶，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水羊毳，野蚕茧所作细布。合诸香煎其汁，谓之苏合。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海中获利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黄河流域的许多地方开始响起了来自草原地区的“胡声”。

魏晋时期，特别是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进入黄河流域，使黄河文化在这一特殊形式下复苏，对黄河文化的繁荣有重要的影响；而到北朝时期，鲜卑族入主黄河流域，给黄河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谓“胡桌”、“胡椅”、“胡床”、“胡服”，传入黄河流域，大大丰富了黄河流域人民的生活。这些最终揭示出黄河文化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融合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的多层次文明。

唐宋时代是黄河文化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时期。是时，突厥、铁勒等游牧民族、朝鲜半岛移民、西域以及西亚、中亚胡人等外来移民相继进入黄河流

域。外来文明在黄河文化的演进历程中非常重要。唐宋时期，黄河文化与外来文明有强烈的互动作用，不仅使黄河流域出现了多种宗教信仰，如景教、摩尼教、袄教、犹太教传入中国，佛教也出现了不同的宗派，如唯识宗、密宗等，更重要的是黄河流域的科学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天文学、医学、药物、植物、动物、香料、玻璃器、玛瑙、玉器、纺织品、货币、音乐、舞蹈、雕塑、绘画、建筑艺术等外来文明促进了黄河流域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发展，同时对黄河流域的饮食、服饰、体育、社会风俗、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繁荣、经济作物的种植等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唐宋时期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来文明的交流往来，对黄河流域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在黄河流域的宗教和科学传播活动，为古老的黄河文化注入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内容。明清时期，西方的宗教、天文学、数学、地理学、机械学、建筑学、物理学、医学、文学艺术、矿业技术、邮电、铁路交通、军事科学、教育思想、教育体制、社会风尚、近代农业科技等相继传入中国，美洲的农作物，如番薯、玉米、烟草等在黄河流域迅速传播、种植和推广，大大丰富了黄河流域农作物的种类，改变了黄河流域人民的饮食结构。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民主思想也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之后，黄河文化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全方位吸收与融合，创建了新式学校、新式军队，产生和发展了一些近代工商业。新式的交通、通信工具等有了初步的发展，西方政治文化也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实践，西式社会风尚开始在黄河流域出现并流行。

如今，古老的黄河文明与黄河文化在自身的基础上，通过对外来文明的合理吸收，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发生了强烈的历史变迁，出现了近代化的特质和内涵，黄河文化正在走向全面繁荣和昌盛。

李正浩

2009年10月26日